

从巴黎时装衍生企业的区位分布看北京疏解难题

王东宇^{1,2} 贺灿飞^{1,2,*} 王宏杰³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100871;2. 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及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北京,100871;3.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研究分院,北京,100044)

【摘要】首先提出世界上疏解城市人口、降低城市密度的举措所面临的普遍困境;然后通过北京和巴黎创意衍生企业区位选择的观察,揭示了城市疏解需要跨越的“第1公里”现象;最后,建议走出对北京城市密度、历史和市场的认识误区,反思反磁力规划理论的缺陷,发挥城市集聚对于后工业时代超大城市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衍生企业;疏解;集聚;北京;巴黎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1 城市疏解:西西弗斯困境与“看不见的手”

人类的发展史,毋庸置疑是一部从乡村向城市迁移的历史。然而,城市既孕育了灿烂的文明,也背负了诸多恶名。我们在享受城市带来的交易、安全、卫生、娱乐和文化等方面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常常会不假思索地将瘟疫、拥堵、污染、犯罪和贫穷的种种困扰,归咎于城市。公元前430年可能导致四分之一雅典人死亡的瘟疫^{[1]91},2003年肆虐北京的SARS,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92万人的香港九龙寨城^①，“蜗居”在北京地下室过百万的人群——所有这些都可能让高密度的城市生活,成为我们恐惧和谴责的对象。因此不难理解,为何逃离北上广的焦虑,每逢春运就会触发的乡愁,可以迅速地引起大众的共鸣。

出于对高密度城市生活带来的“城市病”的恐惧,疏解城市人口、降低城市密度,往往成为政治家、城市居民和规划师们下意识的选择:我们可信手拈来的规划工具就有田园城市、反磁力新城、容积率控制等;我们时常将城市中心区里不那么合意的城市人群和功能,视为城市的负担和“疏解”的对象。在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下,城市的发展受到种

种限制。例如,北京从“二五”时期开始,就确立了控制中心城人口规模的目标;孟买规定中心城区的新建项目的平均高度,必须低于一又三分之一层^{[1]11},几乎要将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控制在郊区的水平上;而“二战”后日本五次国土规划的核心目标之一,也是抑制东京人口和产业的过快集聚,缩小东京与地方的差异。在东京单极集中问题突出的1980年代,日本提出了以200~300个“定居圈”为基础单位的“多级分散型”国土结构构想^[2]。

尽管对城市加以限制的愿望可能很好,但我们可能也会注意到,这些限制似乎总是被隐匿于城市背后的“看不见的手”所击败。北京的人口控制屡败屡战,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北京2004版城市总体规划希望将2020年北京市的总人口规模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3],然而这个数字早在2009年就已突破,并且北京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仍在不断提高^[4]。日本几次国土规划对东京的控制显然力有不逮——无论经济如何起伏,东京都是日本一枝独秀、增长最快的单极城市。

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受到惩罚的西西弗斯。他受罚的方式是:必须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每次到达山顶后巨石又滚回山下^②。我们时常也会发现,所谓的城市疏解与控制时常会陷入“西西弗斯式”的困境——就像他所推动的那块巨石一样,不断地从终点回到起点。

为何我们对于城市人口、产业与功能的控制总是成效不彰?在对城市微观尺度上发生故事的考

* 通讯作者:贺灿飞(1971-),男,江西永新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地理、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E-mail: hecanfei@urban.pku.edu.cn

察中,也许更容易找到有趣的答案。

2 用脚投票:衍生企业分布与疏解的“第1公里”

目前北京控制中心城人口、疏解中心城功能的力度之大,手段之多,可谓空前(也许不能绝后)——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非首都功能搬迁,京津冀一体化等等,不一而足。不过必须承认,疏解和控制的成效如何,最终都会由北京的城市人群“用脚投票”来加以验证。实际上,只要细心观察就能发现,微观尺度上的北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样的“投票”:城市人群自发地通过工作、居住、学习、娱乐等的区位选择或调整,不断塑造和改变着城市的空间结构。这些“投票”的人群之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规院)的规划师们——他们曾在2004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中,为

北京开出宏大的疏解“药方”,希望以通州、顺义和亦庄等新城的建设,建立疏解北京中心城压力的反磁力体系。

中规院作为业界翘楚,在国内对专业人才的吸引自然无出其右,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不过,流水不腐,人员流动对于中规院这样近千人的规划设计机构来说,自然也是合理的——近10年中规院离职的人员就不在少数。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据不完全统计,近10年中规院离职后仍从事规划设计相关工作的职员,竟然有约60%以上的人将离职后初次就业的地点,选择在中规院周边1km左右范围内。也就是说,规划师在中规院工作并积累经验后,离职创办或进入的规划设计机构(衍生机构, spinoff),在区位上与母公司(中规院, parent)完全一致(图1)。



图1 北京百万庄地区中规院及其衍生机构 (spinoff) 区位

资料来源:除注明外,所有图片均为作用自绘

不难看出,这支规划“国家队”的规划师“用脚投票”所表明态度,恰巧暴露出北京宏大的疏解战略在微观尺度上遭遇的尴尬:单从规划设计所代表的北京创意产业来看,北京向数十公里外的反磁力新城的疏解,可能在初始的第1公里就已“碰壁”:我们不妨称之为北京疏解需要跨越的“第1公里”现象。

当然人们会质疑,这些中规院离职雇员在老东

家周边的高度集聚,不过是北京百万庄地区偶发的小概率事件而已,并不具典型意义。但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世界时装设计之都巴黎,可以发现这简直就是巴黎高级定制 (haute couture) 时装设计大师们,持续一个半世纪“用脚投票”故事的精确翻版。

1858年,英国人查尔斯·佛莱德里克·沃斯 (Charles Frederick Worth) 在巴黎和平大街7号,开办了世界第一家高级定制时装屋 (House of Worth),

为皇室、富豪和社会名流设计时装。他的设计受到包括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欧仁妮皇后 (Empress Eugenie) 在内的上流社会人士青睐。沃斯堪称世界高级定制时装设计的鼻祖。所谓鼻祖, 不仅因为他是高级定制时装设计业的缔造者, 更是由于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巴黎时装设计的大师和品牌, 均出自沃斯的嫡传。他们包括保罗·波烈 (Paul Poiret)、罗拔·贝格 (Robert Poiret)、迪奥 (Dior)、伊夫·圣·洛朗 (Yves Saint Laurent) 和皮尔·卡丹 (Pierre Cardin) 等。下面我们不妨考察一下沃斯及其几代嫡传时装设计大师间的族谱关系。

沃斯亲自传授的弟子有两个, 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保罗·波烈——他后来成为奠定欧洲现代服装基调的时装设计大师。保罗·波烈跟随沃斯学习四年后, 在距离沃斯时装屋不到 300m 的地方, 开办了自己的时装设计公司。之后, 他训练了一批雄霸一

个时代的时装设计大师。其中最杰出的弟子是罗拔·贝格, 他于 1933 年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之后, 贝格又雇佣了迪奥。迪奥的公司开办于 1947 年。迪奥的弟子包括伊夫·圣·洛朗、皮尔·卡丹等大师。他们随后也选择了在巴黎独立执业 (图 2)。

非常有趣的是, 考察沃斯高定时装设计公司 (parent) 及其后几代弟子创办的时装设计企业 (spinoff), 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距离大多也在 1km 范围以内 (图 3)。实际上, 沃斯嫡传的每一代时装设计衍生企业与上一代企业的距离, 通常不过数百米。经过不断演化, 巴黎高级定制时装设计企业最终密集地分布在由香榭丽舍大街、乔治五世大街和蒙田大街围合的黄金三角 (Triangle d'Or) 内, 使这个面积仅有 0.25km² 的黄金三角, 成为巴黎汇集了包括迪奥和伊夫·圣·洛朗等众多顶级品牌在内的高级时装企业集聚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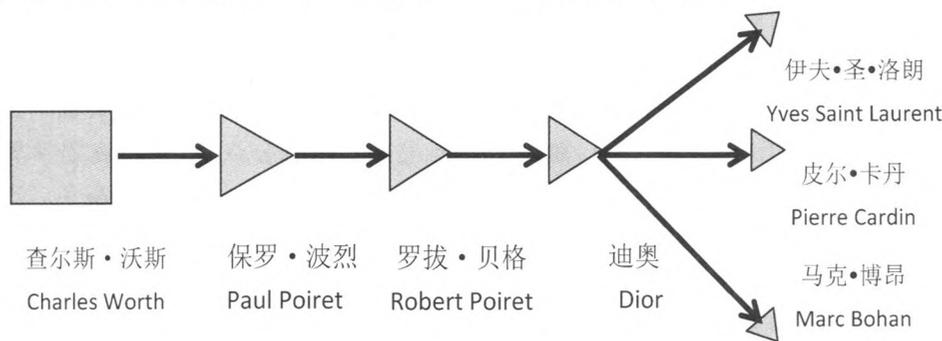


图2 沃斯及其弟子的族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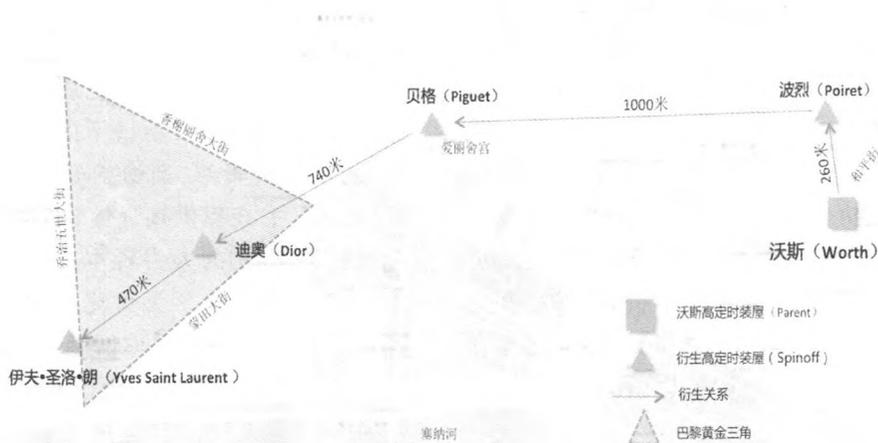


图3 巴黎沃斯高级定制时装屋及其几代衍生时装设计企业的区位关系

很显然, 巴黎时装设计企业在区位选择上也有非常明确的“第 1 公里”现象。波烈、贝格、迪奥和

伊夫·圣·洛朗这些享誉世界的时装设计大师用脚投票表明态度和结果, 竟然与北京百万庄地区国

家队的规划师们毫无二致。对于这一现象, Wenting^[5]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衍生动态(spinnoff dynamic)理论做了很好的解释。

Wenting 研究了 1858—2005 年间,巴黎第一个高级定制女装设计公司(House of Worth)开业后世界时装设计业的发展,使用的文献包括 565 位世界顶尖高级定制时装设计师及成衣设计师的自传等。Wenting 发现,成功的年轻设计师在创办自己品牌之前,一般需要先作为成功的企业家时装设计师的助手,以获得经验(pre-entry experience)。通过彼此的接近,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得以在企业设计师与其助手设计师之间传承。而另一方面,很少有设计师在一家时装设计企业终老一生,他们会在取得经验后,创办自己的时装设计企业(spinnoff)。

Wenting 指出,一方面,时装设计业在巴黎、纽约、伦敦和米兰等少数城市的集聚,可以用衍生对母公司惯例(routine)的复制和传承来解释。衍生的时装设计企业倾向于靠近其母公司选址,以便拷贝母公司的组织惯例(routine)。Wenting 发现,巴黎时装设计业的衍生企业有 70% 仍旧在巴黎开业,而纽约的这一数字则达到 87%。通过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了这些时装设计的衍生企业在微观区位上令人惊讶的“第 1 公里”现象。

另一方面,Wenting 的研究结论表明,巴黎时装设计的衍生企业能够传承母公司的成功,其表现要优于非衍生企业。这一点对我们有相当重要的参考意义:如果我们执意通过城市疏解,强制打破衍生这一动态演化机制,以疏解后的非衍生企业取代“第 1 公里”的衍生企业,将直接导致城市竞争力的下降。

Wenting 认为,巴黎之所以成为世界时装设计之都,是由少数成功企业家推动的衍生动态发展的结果^[6]——既缘于早期杰出从业者的区位选择,更依赖于之后大量的衍生企业靠近母公司发展,并对母公司的组织惯例(routine)进行拷贝,使得巴黎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一直保持其在国际时装设计领域领先的地位(图 4)。

同理,北京在城市发展中表现出的种种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衍生机制在北京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推动各类人才、产业和机构在中心城集聚和繁衍而带来的。显然,这些优势不但无法简单地通过远距离的新城建设和功能疏解获得,相反

会因为我们对北京中心城的强行疏解和强力控制,破坏衍生的过程而消失殆尽。

见微知著,北京和巴黎创意产业的精英“用脚投票”的故事,足以改变我们对城市空间、区位、距离,以及对超大城市疏解战略的既有认识。在这两个故事里,主张建设新城疏散北京城市功能的规划师,却鲜有亲身实践其空间战略的行动,对他们来说,北京的疏解可能“1 公里也不能多”;蜚声世界的巴黎时装设计大师,不断地由学徒而出师创业,但在漫长的一个半世纪的旅程中,大多也只不过走到与祖师沃斯的高定时装屋相距不足两公里的巴黎黄金三角内。他们用脚投票的结果表明,城市,尤其是后工业化时期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城市,对于空间距离敏感的程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3 走出误区:北京疏解的再认识

3.1 密度:被忽略和敌视的财富

基于北京城市发展存在的诸多难以忽视和解决的问题,北京的城市规划从来都不缺少批评的声音,它们既出自公众,也来自规划学界。这些声音大多数的共识是:北京的密度太高了。不过公众同时也困惑于为何严重的雾霾、拥堵和超高的房价,为何仍然难以阻挡 2000 多万人在此高度集聚,造成自己在北京工作生活的不便。客观来讲,公众出于对城市生活直观的感受,对北京建成区的高密度生活做出的批评,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规划学界来说则切忌偏执一端,以直觉替代研究,以情绪左右决策。

本文想强调的是,无论历史成因如何,北京当前的高密度建成区,不仅不应是我们“欲除之而后快”的城市负资产,而恰恰是北京最大的“优质资产”之一。它在提供接近性、交流思想、降低城市能耗、累积多样化的人力资本,以及交通组织等诸多方面,为北京带来了无可比拟的优势,因而不能将其视作城市的负担,采取回避、敌视和破坏的态度。

事实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北京,服务业比例已逾 80%，“运人”替代“运货”，面对面的知识交流超越物流，都要求有更高的城市密度所带来的接近性作为支撑。在一个高度依赖知识交流的城市，知识溢出的距离衰减是非常快的。北京现已形成的较高的城市建成区密度，恰恰成为这座城市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和重要来源。总体上，这也正是后工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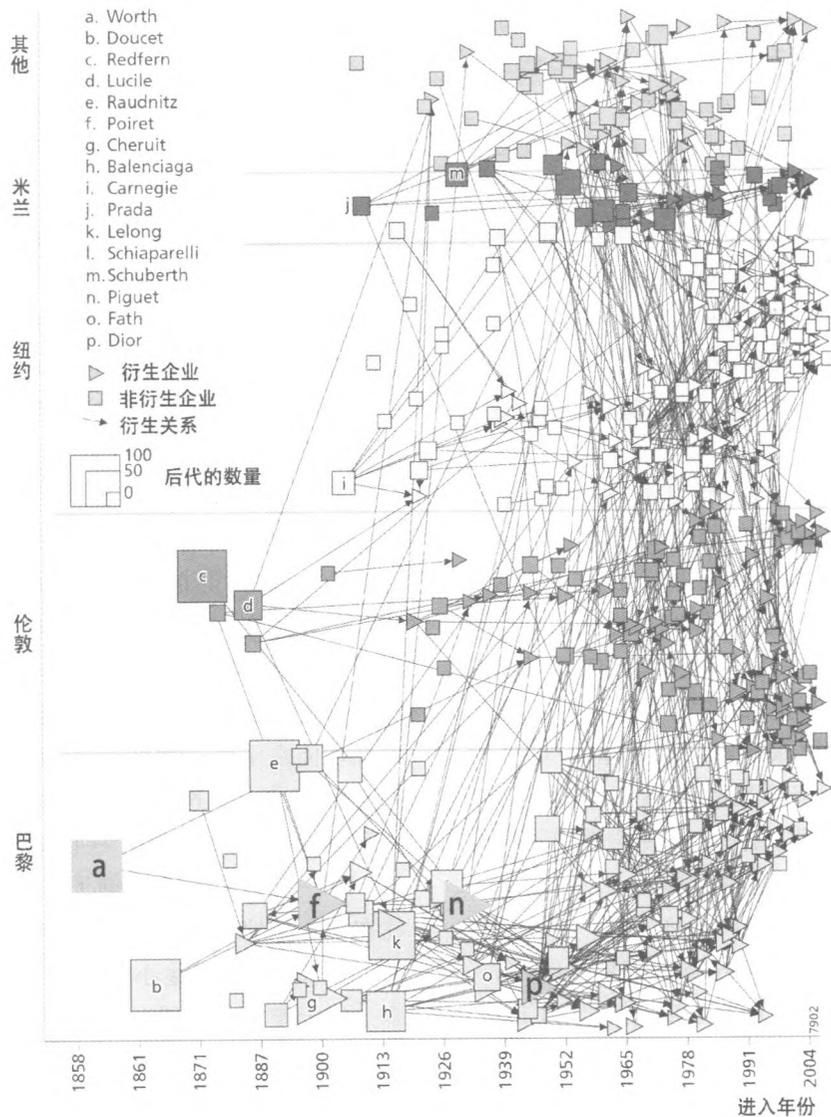


图4 世界时装设计业族谱(1858-2005)

(图中加粗字体(a,f,n,p)部分就是沃斯时装屋及其衍生企业,可以看出衍生动态机制的强大)

资料来源:整理自 Wenting R. Spinoff dynamics and the spatial formation of the fashion design industry, 1858-2005[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8, 8(5):593-614.

城市区别于工业城市的显著特征之一。

因此,在解决城市病的问题方面,要将北京城市空间的集聚,与其带来的负外部性加以区分,“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而非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首先,要消除对北京高密度的建成区环境所怀有的敌意,保持并发挥它在知识溢出、人力资本累积和基础设施共享等方面给城市带来的竞争优势;其次,对于北京交通拥堵、城市拥挤、环境问题等所谓“城市病”,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将其简单归咎于城市的高密度集聚。

哈佛大学格莱泽教授在他所著的《城市的胜

利》一书中写道:“超大城市的规模并非过于庞大,限制它们的发展将会导致更多的困难而非好处。^{[1]65}”“高度集中既带来了成本,也带来了收益。但那些成本是非常值得承受的,……最终城市将取得胜利^{[1]248}。”因此对于北京而言,我们既要计算集聚的成本,更不能“自废武功”,放弃甚至破坏集聚带来的巨大收益。

3.2 历史:应重视城市历史对城市空间演化的影响
演化经济地理揭示了区域和城市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现象。中规院规划师和巴黎时装设计大师用脚投票的故事,正说明产业演化的动态衍生机

制,能够形成城市空间发展上的路径依赖,可以使城市功能紧密围绕某个历史上偶然形成的空间节点不断演化,促成城市的高度集聚。

在讲到巴黎的起源和发展时,格莱泽教授指出:“不论一座城市的起源是多么的普通,城市的集聚都有可能产生神奇的效果。罗马士兵在塞纳河中的一个小岛上驻扎了下来,因为那个地方可以很好地保护他们免受不友好的高卢人的袭击。从那么一个很不起眼的起点开始,在过去的2000^①年中,巴黎人已经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实现了大量的创新。”^{[1] 228-229}

北京的城市空间布局,同样也不能无视悠久的城市历史所触发的空间动态衍生机制及循环累积机制所导致的城市空间发展的路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确应当警惕那些为北京疏解所做的宏大叙事,包括那些动辄将距北京150km外的保定,或是260km外的沧州,确定为首都副中心城市的建议。本文提出的北京疏解所要跨越的“第1公里”,既是北京在知识经济时代维系和延续城市既有优势的坚实“防火墙”,更是北京制定城市空间发展战略所应了解和遵从的重要规律。

3.3 理论:反磁力规划理论的缺陷

反磁力规划理论在我国的城市规划实践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更成为我国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规划实践中反复运用的主流理论,实际上在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先后开展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概念规划)和总体规划中,大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然而,无论从产生的历史背景,对城市现实的解释,还是规划的手段来看,这一理论无疑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例如,它一方面对由规模报酬递增导致的城市空间集聚,以及集聚带来的市场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等缺乏基本的认识,另一方面完全低估了由于高可达性(Accessibility),以及后工业时代城市人群的历史、文化和心理需求,导致历史城区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和超高吸引力。单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这样的不可替代性和超高吸引力,就能成为规划反不掉的“磁力”。因此不难理解,尽管北京在总规中不断尝试建立反磁力城市体系,但最终还是难以阻止城市“摊大饼”式的扩张。因为在某些方面,“摊大饼”恰恰有其空间经济学上的合理性。这是一个值得规划学界深入反思的

问题。

3.4 市场:“上帝之手”还是“看不见的手”?

对于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疏解问题,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即无论谁想扮演“上帝之手”,推动城市空间的疏解和调整,都难以撼动市场的力量,改变市场的规律。在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空间布局问题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替代市场进行决策。在这一点上,前面提到的北京和巴黎创意产业的动态衍生机制,只不过是主导超大城市空间高度集聚的一部分力量而已。历史和实践证明,在城市疏解的问题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常常出乎我们意料。

因此,我们看到,尽管北京疏解、京津冀一体化的出发点良好,但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注定会遇到诸多与其初衷相悖的阻力和困难。例如,我们难以抛开浩瀚、复杂、多变的市场和经济因素及机制,以行政或规划部门的主观筛选,将所谓首都功能和非首都功能在空间上截然分开;我们也很难将北京对外交往、金融、商务办公等功能的空间需求,与周边的河北城市空间的需求“一体化”处理。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北京难以确定大量租住在中心城地下室,就近给中央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送快递的“快递小哥”,有多少属于首都功能,多少属于非首都功能;北京也很难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决定他们当中哪些需要疏解,哪些需要保留。在这些功能疏解后,北京也难以寻求满足中央机构服务需求的替代方案。同样的,在北京中心城对大型批发市场的疏解过程中,“非首都功能”对首都功能贡献的正外部性显然也容易被忽视和抹杀。

4 结语

北京和巴黎这两个超大城市的创意精英,“用脚投票”揭示出城市疏解需要跨越的“第1公里”现象。毫无疑问,北京规划设计机构和巴黎时装设计企业的衍生动态,既是促使城市高度集聚的因素之一,也是北京、巴黎保持竞争力的“秘密武器”之一。

通过城市微观尺度上的观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知识经济时代,尽管信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使得远距离沟通的成本大幅下降,但超大城市对于接近性的要求,不仅丝毫没有降低,反而大大增强,从而颠覆了传统反磁力规划理论的逻辑基础。而接近性恰恰是高密度城市赐予我们的珍贵

礼物。

当然,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化解或降低城市集聚和高密度生活所带来的负外部性。但对于大城市与超大城市的疏解和限制,已经成为政府、规划界和公众的主流“共识”(或集体无意识)的时候,我们的规划理论与实践工作,恰恰需要抱持客观和求真的态度,探求和顺应城市空间发展的规律,在此基础上以正确的价值观去引导城市的发展,从而避免陷入无谓的“西西弗斯困境”。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中国超大城市空间发展的战略,正是关乎我们未来国际竞争力的大事。城市的集聚为我们带来了繁荣,我们应当改变对高密度城市生活的敌意——正如格莱泽教授所言:“最终城市将取得胜利”。△

【注释】

①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2107864>

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西西弗斯#cite_note-1

③ 注:原文为“200”。

【参考文献】

- [1] 爱德华·格莱泽. 城市的胜利[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91.
- [2] 林家彬. 日本国土政策及规划的最新动向及其启示[J]. 城市规划学刊, 2004(6): 34-37.
- [3]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J]. 北京规划建设, 2005(2): 5-51.
- [4] 张兵.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国家空间治理的战略性思考[J]. 城市规划学刊, 2016(4): 15-21.
- [5] Wenting R. Spinoff dynamics and the spatial formation of the fashion design industry, 1858-2005[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8, 8(5): 593-614.
- [6] Wenting R. The Evolution of a Creative Industry[M]. Utrecht University, 2008: 71-73.

作者简介:王东宇(1973-),男,山西长治人,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城市规划研究。

收稿日期:2016-12-08

From the Location of Paris Fashion Design Spinoff Firms to See the Dilemma of Functional Dispersal in Beijing

WANG Dongyu, HE Canfei, WANG Hongjie

【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comes up with the dilemma trying to disperse urban population and lower the density of urban area across the world. Then,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f the spinoff location of Beijing and Paris creative industry firms, the concept of “first kilometer barrier” that urban functional dispersal will hit is proposed.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clear away the misunderstandings of the significance of urban density, history and market of Beijing, and reconsider the defect of the anti-magnetic urban planning theory, and value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urban agglomerations play for the megacities in a post-industrial era.

【Keywords】 Spinoff Firms; Functional Dispersal; Agglomeration; Beijing; Paris